

②① "Drive to Topple White Rule in Africa: U. S. Talks Tough", *U. S. News World Report*, May 10, 1976, PP. 31-32, 35.

②② "Kirsinger's End Game", *News Week*, May 24, 1976, P. 19.

②③ "Drive to Topple White Rule in Africa: U. S. Talks Tough", *op. cit.*

②④ *Le Monde*, 30 avril 1976.

②⑤ 中央日報，民國六十五年五月一日。·*Le Monde*, 29 avril 1976。

②⑥ *Le Monde*, 5 mai 1976.

②⑦ *Le Monde*, 9-10 mai 1976.

②⑧ "Talking in African Terms", *News Week*, May 10, 1976, P. 14.

②⑨ "Drive to Topple white Rule in Africa: U. S. Talks Tough", *op. cit.*

②⑩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y 8, 1976.

民國六十五年五月廿二日完稿

英國工黨政府的變動及其難題

張允德

一 前言

據美國專欄作家羅斯特 (Vernmont Royster) 在「華爾街日報」一篇專論「英國：一個研究的範例」(Britain: A Model Study) 中指出，英國是歐洲的患病國家，其病態到處可見。外在的症狀是英鎊狂瀉；工業生產減縮；通貨膨脹率偏高。內在的症狀也很明顯，英國的工業生產設備大多陳舊，其工業很少能與共同市場的其他會員國相頡頏。不但如此，英國人民的生活水準要比相等的歐洲國家為低，更比美國低得多。他又說，英國的衰落是它自己一手造成的。易言之，它今天會到這個地步是由於政府所定的政策和人民所接受的態度而來的。自毀的公式很簡單，只要給國家一副挑不起的經濟重担就行了。英國的重担，就是那「包括一切的」(all-encompassing) 福利計劃。例如：免費醫療、房屋津貼、糧食津貼、交通津貼和許多其他的福利項目。①

無可否認，福利計劃是好的，民主國家多半在實行社會福利政策；問題是在制定計劃及政策時，政府是否把它定得太廣，假如它過多過重，國家的

英國工黨政府的變動及其難題

經濟必然被壓垮。

持平而論，英國經濟難題，並非始自今日，其原因也非一端，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即已潛伏病根，加上工黨執政期間，迭遭經濟衰退和能源危機的衝擊；生產落後；工潮頻起；失業人數增加；英鎊匯率一再下跌；福利計劃開支浩大，使其經濟愈趨困境。

據英國官方統計，公共開支在一九七三年佔國民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五十七，去年跳到百分之六十；國家負債在一九七六年不過八十億美元，本年度竟增至二百五十億美元，這些數字都說明了英國經濟負擔之重。

二月中旬，英財相愛禮宣佈公共開支白皮書。政府預計今後逐年削減公共開支約五十億英鎊（一九七七——七八年度十八億鎊，一九七八——七九年度三十億鎊）。其中包括福利計劃、國防及政府行政等方面之經費。削減福利方面之費用，雖然有背於工黨所標榜的福利政策原則，但為了解救經濟困難，這也是不得已的措施。

保守黨批評威爾森政府縮減軍費之不當，節省其他公共開支為數太少；工黨左派則反對削減社會福利費用。三月十日，此項逐年削減公共開支提案

在下院表決時，三十七名工黨左派議員放棄投票，結果以二五六票對二八四票遭受否決，以致造成政府的空前重大挫折。因此本案關財政預算，屬於重要法案，表決失敗，問題相當嚴重，但威爾森依然接受挑戰，次日在下院提出信任案，工黨左派議員懾於事態嚴重，紛紛投票支持政府，結果幸以二九七票對二八〇票贏得信任，但僅有十七票之多數（從票數看出仍有工黨議員放棄投票任票）保住了工黨政府的壽命。

英國工黨內部本來早有存在左、中、右三派勢力，平時互相競爭，以取得影響力去制定黨的政策。工黨左派勢力日增，爲了鞏固來自工人支持的基本力量，自然不會贊成削減社會福利費用，以致演成一場風波。

工黨左派僅爲鞏固它本身的勢力，未能體念時艱，亦未顧及整個國家經濟的前途。其所見不大，誠如「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與薪」。

一 威爾森辭職

三月十六日，在五天前剛過六十歲生日的威爾森 (Harold Wilson) 宣佈：他已向女王提出辭職。一俟工黨選出新的黨魁，他的辭職即告生效。同時，唐寧街十號官員說，內閣無意辭職，因威爾森個人決定達到六十歲後即退出積極的第一線政治。

這項消息使英國人震驚。探究威爾森自行辭職的動機，各方衆說紛紜，莫衷一是。大多認爲英國經濟困難與工黨內部分裂爲其辭職的主因。但二者都是爲時已久的老問題，以往有很多難關，他都能渡過，而沒有請辭，爲什麼他偏偏要現在辭職呢？

從表面來看，威爾森辭職時間的選擇，是受了下院否決他政府所提削減公共開支案的刺激，他認爲這是黨內左派份子對他的最大一次挑戰，阻止政府重要施政，他已感到不能忍受，遂毅然宣佈辭職。但這場風波於其說是他辭職的主因，不如說是決定他是否辭職的導火線，最多也不過加速他的決定，使他更容易下定最後決心而已。假如沒有這場風波，他也會辭職的。

那麼，我們不妨在威爾森長達五頁的辭職聲明中，尋找一些答案，看他自己如何解釋。

他說，去年十二月他曾向女王報告，他就決定今年三月辭職，交棒給一

個繼承者。他又說：「在一九七四年三月（按：他三度掌權後的一個月）我便決定任期不超過兩年，我並沒有動搖我的決定，而且也不會更改的。事實上，我本來決定在去年九月便辭職的，但爲了要確保去年七月政府宣佈的反通貨膨脹政策 (counter-inflation policy) 被國人所接受和成功，後來決定延期。」

接着威爾森列舉他辭職的四點理由：

「(一) 我已經領導這個黨超過十三個令人興奮和困擾的年頭，其中幾乎有八年是組閣的。我任首相職位的时间較諸本世紀過去任何一個和平時期的英國首相爲長。

「(二) 我對黨國都有責任不再留在這個職位，以免妨礙別人尋求選舉出掌此職。

「(三) 以我所見，我的繼承者應在此時接掌這個職位，以運用他或她的風格來爲本屆國會剩餘的年月努力制訂一項戰略 (strategy, 或譯策略)。但我敢肯定，新的政府將會如我們向世界展示的在反通貨膨脹政策上採取相同的決定。同樣地，我完全相信內閣改組，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削弱我們對盟邦和伙伴全力履行承諾的決心。

「(四) 在我參政生涯中，有一個危險一直警戒着我。那便是在劇變的時代裏你可能面臨一項決定，其情況可能與你以前所面臨的迥異。如果在較早的時候，你可能考慮或拒絕一個行動的特殊步驟，那就是說你已陷於其中，使你無法作出目前情況所需要的一個新思考。我決定不向這個危險屈服。」

上述第一、二兩點說他久任斯職及退讓賢路，實爲他倦勤之主因。威爾森發跡甚早，在政治上被稱爲「神童」，過去十三年中四度拜相，歷經經濟衰退、能源危機、北愛爾蘭叛亂、羅得西亞獨立、進入歐洲共同市場等艱苦問題。

依威爾森所述，首相的職務是令人珍視、刺激、滿足而有趣味的工作，但它是一個全時間的職業。他曾主持內閣會議四百七十二次，主持內閣各種委員會數千次，答覆國會質詢一萬二千次。他曾每週工作七天，每天至少十二到十四小時，通常忙了一週之後，在週末至少還要閱讀五百種不同的公文。作爲工黨黨魁，他必須和民衆接觸，向政治及其他集會發表演說，在過去十三年中，他每年的演說平均在一百次以上，幾乎包括每個選區，某些選區

甚至多次。

在這種日理萬機，責重事煩的情況下，對於他的引退，他的太太詩人瑪麗可能最具影響力了。喜歡過寧靜私生活的瑪麗，早在兩年以前威爾遜三度掌權之後，就拒絕遷入唐寧街十號首相官邸，而寧願住在他們自己的家中。她自然盼望她丈夫早日退休，多享受家庭的溫暖。如此說來，寧非闖令使然耳？

第三點，他認為他的繼承者應在此時接棒了。今年三月初，威爾遜本來想在三月九日他六十生辰前兩天辭職，但為顧及對兩個選區補缺選舉的不利影響，故又展延一週。三月十一日威爾遜贏得攤牌性的信任投票後，但不幸消息傳來，兩區補選工黨均告慘敗，對工黨士氣打擊很大。

本屆工黨政府成立於一九七四年十月大選之後，照理下屆大選應在一九七九年。本屆國會成立之初，在全部六百三十五席中，工黨獲三百一十九席，保守黨獲二百七十六席，自由黨獲十三席，其他各小黨共獲廿七席。工黨比保守黨多四十三席，比過半數多一席；若與各反對黨合計比較則多出三席。工黨此次補選失敗，其議席已少於半數，雖然它在國會情勢尚稱不惡，但已有不利的影響，誰能預料今後兩年半會發生什麼變化呢？③

威爾遜此時交棒，是讓他的繼承者早些熟悉對付經濟的困難及其黨內的紛爭，並對未來大選早作部署。威爾遜給他的繼承者及其閣員們一個忠告，勸他們要深入民間，與人民多接觸，向人民解說工黨的政策，並聽取人民的反映。最重要的他們要記住，工黨是個民間的政黨，而不是西敏寺宮（Palace of Westminster）的政黨或史密斯廣場（Smith Square，工黨總部所在地）的政黨。威爾遜此舉可謂用心良苦，亦可看出其人精明之處。

第四點，說明他處理問題的方法。他既非杞人憂天，亦非猶豫不決。例如：他過去想辭未辭，只因時機未到。首相任務雖然艱苦，但從來不為問題難倒。

威爾遜說，一個政府的持續和成功所要的代價是永遠的警戒——在職責和需求上每天時刻保持警戒。但是你必須抽出時間置身超然的地位，多思考政府的問題——它的目的、它的協調和它的長期戰略。

威爾遜自稱是位國會中精於議事的專家（a parliamentarian），他喜愛國會並希望繼續為它服務。儘管企業界和學術界以高薪相聘，他也不會在外面接受新的任命。

威爾遜和過去的邱吉爾一樣，都是不願在辭卸首相之後循例晉封勳爵進入上院，而仍願留在下院，繼續參與現實政治生活。論功業，威爾遜自難與邱翁相比，而且現在並非最後論定之時。

三 賈拉漢膺負重任

自威爾遜自動宣佈辭職之後，工黨內部就掀起繼任黨魁的角逐。此項人選要由該黨下院議員進行秘密投票，須在三一七位議員內獲得過半數支持始獲當選。最初競爭者達六人之眾，一般斷定首次投票難獲結果，必須在繼續投票過程中淘汰得票最少的競選者，到最後始見分曉。果然首二次投票中都無人獲得過半數，後來只剩外相賈拉漢（James Callaghan）與就業大臣傅特（Michael Foot）二人，四月五日第三次投票揭曉，前者終以一七六票對一三七票擊敗後者而當選。

當工黨內部競選期中，左派傅特的勢力雖然很大，但人們大多屬望賈拉漢。他的受人支持，乃因他一向的政治主張比較溫和，與黨內各方面都較接近，關係相當良好，所以終能在最後回合中擊敗傅特。

宣佈投票結果的當天下午，威爾遜往白金漢宮晉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交出相位，女王遂後召見了執政黨新黨魁賈拉漢委以組閣重任，賈拉漢吻了女王之手以示接受。

當晚，在一次全國性的電視演說時賈拉漢稱，他的任務是領導這個國家脫離三十年代以來最可怕的經濟困難，他警告國人，解決英國經濟困難的方法並不容易。他說：「我們尚未賺得我們正享受的生活水準。」「我們只是靠借貸才維持我們的生活水準，這種辦法不能無限期地繼續下去。沒有輕鬆的選擇。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我不向你們保證任何真正的安適。」他又說，「作為一個國家，只要不欠債太多，我們便能改善生活水準；否則將永遠達不到。」

賈拉漢要求支持為緩和英國通貨膨脹束緊褲帶的必要措施，他表示，倘若不強制節約，「我們將永遠無法克服失業。」

綽號稱為「光明吉姆」（Sunny Jim）的賈拉漢，並不過份悲觀，他認

爲，只要舉國動奮，英國會有前途的。「我們的政府是個自由國家的政府，其舉措必須獲得人民的同意——給我們一個特別的責任來講實話、告訴人民、相信人民，並使我們贏得人民的愛戴。那就是我所盼望進行的途徑。」

除了上述經濟問題是賈拉漢施政的第一優先之外，其次，工黨的團結也是他的重大工作。值得一提的，在投票選舉黨魁結果剛揭曉，他即席向工黨國會議員演說時，就談到他將來的意向，他說：「在我的政府中沒有所謂圈內人、圈外人，也沒有私人派系，對於過去的事，我準備一筆勾消，我要求每一個人也都這樣做。」他接著指出這番話包括「在下院中那些自己作主的派系——特別是講壇派（the Tribune Group、左派）和宣言派（the Manifesto Group、右派）的議員們」。他告訴兩派人士稱，他們任何一方都沒有「約權」（the ark of the covenant）。

他又說：「本黨的黨務工作者盼望你們對本黨會議，而不是你們的派系集會，盡最大的忠誠。當工黨的小派系想運用他們的立場以代替全黨時，我一定不接受。」④

賈拉漢的談話立刻引起了宣言派主席梅本博士（Dr. Dickson Mabon）的反應，他迅即向講壇派提出一個建議，假如後者同意的話，在一天之內雙方採取同樣解散的行動，但後者不爲所動。

現在問題的關鍵，似不完全在於工黨組織的形式，而在於它內部的具體表現，能否以全黨及國家的利益爲先。照賈拉漢的話說，工黨的團結以及國會中該黨對政府的支持，能使大選「到我們對它準備好的時候」才舉行。那麼，要看將來情勢的發展了。

新政府未來施政重心，決先對內而後對外。對外政策，大約是「蕭規曹隨」，與威爾遜時期沒有什麼特殊的改變。

賈拉漢一九一二年出生於朴次茅斯，現年六十四歲。他曾受中等教育，做過很多基層工作，自一九四五年起一直爲卡地夫選區的國會議員，先後擔任過財相、內相及外相三個重要的職位。

四 從預算案看經濟前途

四月五日晨，在工黨選舉黨魁尚未揭曉之前，威爾遜主持了他最後一次

的內閣會議，聽取財相奚禮（Denis Healey）報告的預算案大綱。此案早經擬訂完竣，因此新政府所要施行的，不過是威爾遜政府政策的延續。次日（賈拉漢上任的第二天），奚禮向下院提出年度預算案，他重申政府已將通貨膨脹列爲「頭號敵人」。爲了減低通貨膨脹及失業人數，並增加工業生產，奚禮提出他所謂的「經濟戰略」。他認爲這項戰略可使英國進入一九八〇年代時，得到充分就業、物價穩定與國內外的經濟平衡。

這預算案列舉的項目繁多，最引一般人注意的，一爲工資問題，一爲工業生產及出口問題。

（一）政府表示願意減稅十三億鎊，條件是工會必須同意接納百分之三的工资增加限額（大約二鎊）。這說明，新政府將與工會進行協商，重新訂一個增加工資的限額，以代替威爾遜政府去夏所訂增加工資不得超六鎊的規定。六鎊的規定將於今年七月屆滿。

工黨政府開出的這項「有條件交易」，在工業國家中實不多見。政府認爲，既使工資的增加受限制，但由於賦稅的減低與通貨膨脹的減輕，人們仍將有更多的收入。

對於這項建議，工會領袖們顯然表示不滿，英國工會聯合會（TUC）理事長穆瑞（Len Murray）當天形容這預算是「一個討論的地點」。他說，工會將提出他們對工資和薪水所要求的數字。

該預算案在國會中亦受到保守黨領袖柴契爾夫人猛烈的抨擊，她指控工黨政府將有關大多數人民所得稅的負擔給只代表少數人民的工會聯合會合作決定，它這種作法是「只講徵稅而不講選舉代表的權利」（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言外之意，工黨政府所作所爲是不公平的，勢將影響全體英國選民。

（二）該預算案預測，自今年八月開始的十二個月內，英國的國民生產毛額會增加百分之三點五，出口增加百分之九，並希望自一九七九年把英國的失業率由目前的百分之五點五降至百分之三。奚禮稱，要達到這個目標，製造業的生產額必須增加百分之八點五；這種增長幅度雖大，但並非不可能。

因通貨膨脹，政府在過去將所得稅及貨值附加稅（value-added tax, VAT）的稅率提高，無形中抵銷了工資的增加，這種水漲船高的情形，按時計酬的工人自然不肯努力多做了。目前政府已表示願將所得稅降低並將貨

值附加稅減半，似為刺激生產之一途。

工黨政府寄望於擴展出口，似有可能，一是英鎊不斷變相貶值，英國貨物出口價格相對降低，有利於外銷。二是西方其他若干國家經濟復甦，進口增加，從英國輸入貨物亦多。英國的出口今年一月份為十七億七千八百萬鎊，二月份跌至十七億五千六百萬鎊。據倫敦最近兩項商業調查顯示英國經濟可能復甦。英國工業聯合會四月五日透露，製造日用品的廠商現在接到較以往為多的訂單，同時，出口的貨品亦呈現起色。⑤但以目前的情形而論，英國的出口展望，還不能說十分明朗。

凋敝已久的英國經濟，今後是否有復甦的機會，國際間非常注意，誠以此西歐主要國家的經濟問題如果長此惡化下去，其對歐洲及世界的影響力亦有不少關連。

五 新閣人事簡析

賈拉漢於四月八日宣佈組成新閣，這個新閣僅將前任內閣若干部門及閣員予以更動，並審慎地平衡了左派與右派之間的勢力。由於人事的更易，也可能出現一些稍微不同的局面。新閣名單如下：

首相兼財政第一大員 賈拉漢；樞密院議長兼下院議長 傅特；大法官 艾溫瓊斯爵士；內政大臣 詹金斯；財政大臣 奚禮；外交大臣 克勞斯蘭；物價、保護消費者暨會計大臣 威廉斯夫人；能源大臣 班恩；工業大臣 瓦利；環境大臣 蕭爾；國防大臣 梅森；蘇格蘭大臣 米爾蘭；威爾斯大臣 摩里斯；北愛爾蘭大臣 瑞斯；農漁暨糧食大臣 皮爾特；就業大臣 布斯；貿易大臣 戴爾；社會服務大臣 恩納斯；蘭開夏公國大臣 利威爾；掌璽大臣 薛本德爵士；教育及科學大臣 穆里；海外發展大臣 普林蒂斯；計劃暨地方政府大臣 席爾金。

原被看好會出外相的詹金斯 (Roy Jenkins)，繼續留任內相。反對黨保守黨外交事務發言人莫德齡說，不委任詹氏為外相是一種錯誤，因為他經驗豐富而且在歐洲聲望亦高。根據倫敦泰晤士報四月九日社論中指出，賈拉漢在組閣時他決定不任命詹斯為外相，此事會引起爭論。該報作了一個冷靜的評估，認為克勞斯蘭 (Anthony Crosland) 担任外相有更好的資格：

英國工黨政府的變動及其難題

(一) 雖說克氏尚少外交手腕，但他是位非常能幹而和藹可親的人；(二) 更重要的，克氏像首相一樣，都認為英國進入歐洲經濟社會是樁次要的事，將遵循工黨對歐洲政策的迂迴路線 (winding course)。賈拉漢是位冷淡的歐洲人 (a lukewarm European)，克氏也是位冷淡的歐洲人。因此，在首相和他的新外相之間有一種政策的同感 (a sympathy of policy)，假如任命詹氏的話，就沒有這種同感了；(三) 一個更令人憂慮的確實證據，左派企圖投票反對詹氏担任外相，這種左派的反對票不是首相的唯一考慮，但却有些份量。除非首相能對抗來自左派的這些威脅，否則他的政府將會失敗。⑥

又據國際前鋒論壇報四月十日社論中指出，賈拉漢決定克勞斯蘭為外相，這一重要任命為英國的北約盟國和歐洲共同市場伙伴們所歡迎。克氏為大西洋聯盟的堅強辯護人，英國進入歐洲共同市場的一個早期的支持者，一個現代的現實主義的政治家。克氏可謂時來運轉，若非威爾森於此時退休，他尚無機會從環境大臣遷調為外相的職務。⑦

同時，奚禮盼望得到外相的職位已經很久了，但當工黨政府現階段正設法控制通貨膨脹並從事經濟復甦之際——提出新的嚴格的預算之後——賈拉漢覺得必須保留奚禮為財相，而不把他調到外交部。

前就業大臣傅特被委任樞密院議長兼下院議長，特別負責推行蘇格蘭及威爾斯分別成立議會計劃。前樞密院議長蕭特 (Edward Short) 退出內閣，但留任工黨副領袖。

前任內閣中另三名閣員也同時辭職，仍留在下院担任後排議員，他們是：社會服務大臣卡斯圖爾夫人；蘇格蘭大臣羅斯；以及政府在下院的紀律長 (Government Chief Whip) 梅利希。

再就賈拉漢本人來說，可謂是臨危授命，他從威爾森接受的繼承物，比他很多他的前任所得到的更可怕。在這種情況下，給一般的國人甚至他國會中的同事一種印象，認為他將是一個看管者，憑他的經驗和穩當的作風，能夠領導國家渡過眼前的難關，然後及時地交給一個更年輕的繼承人。據曼徹斯特衛報四月六日社論評述，對上項看法表示懷疑。該報認為：英國目前困境所需要的遠比一個看管政府要多。顯然賈拉漢也認為如此，在過去數日他曾決定不在公眾場合說什麼，但他已讓大家明白，他希望扮演一個更積極的角色，不同於一般人對他的預測。⑧

六 其他難題

(一) 冰英斷交：英國目前外交上最頭痛的問題就是與冰島的所謂「鱈魚戰爭」(Cod war)了。這個「戰爭」歷時已久，一九五八至六一年，一九七二至七三年，這兩個同屬北約組織的盟國，即曾因冰島外海豐富鱈魚場的捕魚權利問題，兩度發生嚴重的爭執。最近的一次衝突是，去年十一月，冰島政府因英國對鱈魚的捕獲過量，而再度擴大其沿岸捕魚海域。這直接關係到英國數千艘拖網魚船的生計，故英國拒絕接受這項限制，於是冰島政府出動砲艇，切斷英國漁船船網，英國政府亦決定還以顏色，遂派遣軍艦保護其拖網魚船，這些船艦曾與冰島的砲艇數度發生碰撞事件，雖經兩國政府首長直接會談，北約組織秘書長龍斯的從中調停，但雙方立場各異，談判遂告破裂。冰島總理賀格倫遜(Geir Hallgrímsson)於二月十九日宣佈，冰島與英國斷絕外交關係。此事的發展，對北約盟國構成了一項新的威脅，更使西方團結蒙上了一層不利的陰影。

(二) 五國聯防的式微：威爾森政府曾於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宣佈，英軍將於一九七一年底以前自蘇彝士運河以東地區撤退。其撤退的理由，完全以經濟緊縮政策為出發點，為著減輕負擔，寧持自固吾圈的退守政策。保守黨則認為，英國對世界和平負有責任和承諾，縱因本身經濟困難，亦不可輕言放棄。一九七〇年奚斯上台後，迅即採取與工黨政府相反措施，決定繼續在運河以東駐留若干兵力，並於一九七一年建立英、澳、紐、馬、星五個聯防的新體系。一九七四年威爾森三度及四度掌權後，又舊調重彈，自去年五月起將英國在新嘉坡駐留的兩千餘名象徵部隊分批撤退，至今年三月底已全部撤完，目前尚有澳紐兩國的零星部隊駐留。論者認為，中南半島變色後，泰國及星馬地區正面臨赤色恐怖的威脅，英國就此完全撤出，是否合乎時宜？值得商榷。

(三) 歐洲共同市場問題：幾經波折，英國終於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正式成為歐洲共同市場的一員，但自一九七四年威爾森三度執政之後，抨擊奚斯政府加入「共市」所付出的代價太大，因而對本國經濟不利，即展開與「共市」重開談判行動，畢竟此事體大，曾惹起法國與西德的反感。實際上，英國加入「共市」，其政治意義大於經濟意義，應從長遠來看，似不宜基於短期

的國家利益而有所反顧。賈拉漢當政之後的態度如何？目前仍不得而知。不過此事誠關乎西方的團結問題。

(四) 北愛爾蘭新教徒與天主教徒之間的流血衝突時有所聞。目前在北愛爾蘭的英國陸軍，雖不到一萬六千名，但對為數一百萬的新教徒和五十萬的天主教徒而言，確有一些防止他們發動全面內戰的嚇阻力量。如果英軍撤離，新教徒就擁有壓倒性的優勢；如果佔多數的新教徒對天主教徒發動攻擊，在其南面人民大多為天主教徒的愛爾蘭共和國，將面臨巨大壓力而進行干預，那就是說，這個綠色的島嶼，將陷於全面的戰爭。

(五) 由於蘇格蘭及威爾斯民族主義運動日漸增強，英政府計劃給予二地設立地方議會。這計劃曾於去年十一月廿七日在政府的白皮書中宣佈，其中敘述設立蘇格蘭與威爾斯議會的法律將在今年春季向國會提出，但它說，這兩個議會可能不會在一九七八年以前設立。今年元月中旬國會從事辯論時，威爾森曾提出一項嚴厲的警告，政府排除蘇格蘭與威爾斯完全獨立的可能性，他說：「政府拒絕聯合王國解體。」賈拉漢上任後也很重視這個問題，現在傅特已被委任主持其事^①。

註① Brain: A Model Study, by Vermont Royste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 20, 1975.

註② Prime Minister's Resignation, *The Times*, Mar. 17, 1976.

註③ 詔料不久因衛生部次長歐馬里(Brian O'Mally)的逝世及工黨議員史東豪斯(John Stonehouse)的退黨，工黨在下院又少了兩席。London (UPI), *China News*, Apr. 8, 1976.

註④ Callaghan pledge: Trust the people, by Ian Aitken, *The Guardian*, Apr. 6, 1976.

註⑤ 星島日報，民國六十五年四月七日，法新社倫敦六日電。

註⑥ Good but for one choice, *The Times*, Apr. 9, 1976.

註⑦ Callaghan's Cabinet,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pr. 10—11, 1976.

註⑧ Mr Prime Minister Callaghan, *The Guardian*, Apr. 6, 1976.

民國六十五年四月廿七日完稿